# 马思贞：为革命事业献出年轻的生命

兰占杰 李延藩 邵予奋

马思贞（1917—1948），出生于今西吉县沙沟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6年6月，红军西征来到固原、海原一带，向当地群众宣传民族平等、回汉团结、“打土豪救穷人”的革命道理，马思贞听了很受鼓舞。1941年5月3日，马思贞跟随其兄马思义投奔陕甘宁边区，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1941年7月，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抗日回民骑兵团。解放战争中，部队改编为陇东回民骑兵团，马思贞任一连连长，转战陇东高原，屡建战功，战士们称他是“作战勇敢，有勇有谋的指挥员”。1948年5月1日，在与敌八十二军独立第五团战斗时牺牲，年仅31岁。

## 苦难的少年时代

马思贞3岁时，海固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沙沟是震中地带，他祖父母、叔父母、大哥和3个姐姐共8人罹难。家中原有的耕畜都被压死，剩下180垧土地，缺劳少畜，无力耕种。因此，他从能参加轻微劳动时起，就帮助母亲干家务，帮助父兄务农。母亲最喜欢他，经常给他灌输勤劳、诚实、和气、宽厚等为人处世的道理，他也爱听母亲的话。

15岁那年，母亲去世。4年后，哥哥马思义又被国民党抓了兵。从这时起，马思贞就开始担起了主持家务的重担。为了不使父亲和继母操心劳苦，他孝顺父母，尊敬兄嫂，爱护弟妹，关心子侄。因此，在家里马思贞备受父母器重和弟妹尊崇，在邻里亲友中也受到好评。

1936年6月，红军西征来到固原、海原一带，向当地群众宣传民族平等、回汉团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和“打日本救中国”“打老蒋救西北”“打土豪救穷人”的革命道理，马思贞听了很受鼓舞，点头叫好，并非常羡慕跟着红军离乡出走的乡亲。红军，在他的心灵深处打下了烙印，对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海固起义死里逃生

海固地区是回族聚居区，土地瘠薄，灾害频繁，人民群众生活非常贫困。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不仅不设法解决群众的生计问题，反而不断加强剥削和掠夺，并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以“抗日”为名，增捐加税，敲诈勒索；鞭打绳拴，强行抓兵，引起回族人民强烈不满。1938年10月，海原县在鹞子川一次抓去10多名青年当兵，关在白崖（今属西吉县）乡公所，不许家人探视。群众气愤不过，揭竿而起。马思贞等数十人，在父亲马喜春的带领下，冲入白崖乡公所，把被关押的青年解救出来。

1939年1月15日，海固回民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爆发后，马思贞积极响应。当天，在起义领导人马国璘带领下，他参加了在红套村攻打土豪王国义堡寨的义举。23日又与起义农民一起围攻固原县城（未攻开）。二十几天后，由于起义领导人马国琮接受了安抚，马国璘负伤离队，马英贵被捕，群龙无首，自行解体，起义归于失败。

同年5月29日，马喜春又带领他们兄弟4人参加了马国瑞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父亲是起义军领导人之一，被任命为旅长。马思贞在起义军司令部特务连警卫排当兵，大哥马思义是警卫排排长。起义后，起义军在小坡儿、何家堡、黄花川等处，勇敢地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冲破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包围。在白沔河战斗中，敌人调集重兵，实行南北包剿，又派飞机数架，低空盘旋，来回扫射。起义军虽拼死苦战，终因装备太差，寡不敌众，伤亡十分惨重。马思贞的父亲阵亡；长兄马思义、四弟马思恭负了重伤。他和马思荣轮换背着马思义死里逃生；三弟马思聪和马思恭跟随大队回来，各自离散。

这次起义失败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悬赏捉拿不投案自首的人。马思贞四处躲藏，决不投降。1940年冬，他跟随长兄马思义和乡亲们开始了“除奸”行动，先后消灭了30多个土豪劣绅和反动保长，为发动第三次起义扫清了部分障碍。

1941年5月3日，马思贞又参加了由长兄马思义组织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接着在上白崖、泉沟垴同国民党军队厮杀。在马思义的带领下，起义军突破敌人包围，进入清水县大麻子山，歼灭国民党四十二军预备第七师一个团的大半兵力。他和三弟马思聪在作战中英勇顽强，奋不顾身，马思聪不幸中弹牺牲。他含着悲痛，掩埋了弟弟的尸体，又跟随起义军转战张家川、圣女川、沙塘川，后被装备精良的敌军包围于石蛤蟆垴。全体起义军在马思义的指挥下，同敌军白刃肉搏两天两夜，冲锋数十次，死伤千余人，才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到红羊北山，敌军又尾追上来，他们边打边撤，乘着一阵急雨，撤到东海坝。起义军已两天两夜没吃没喝，人困马乏，人数由2万多人减到五六千人，前两次起义失败的凄惨阴影又笼罩在大家心头。

转移到石岘子时，起义军只剩下1000余人，形势越加危急。马思义当着大家的面提出了进边区投红军的主张。人们议论纷纷，许多人留下马匹纷纷离去。此时，马思贞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民族解放，海固回民三次起义，历时二年半，起义队伍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多少年轻的生命英勇牺牲，多少父老乡亲惨遭杀害，现在起义又面临失败，何去何从，必须正确抉择，当机立断。于是他坚决支持其兄投奔边区的正确主张，并义正词严地说：“听说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幸福的，我们应该进入边区，投靠共产党，就是死了我也心甘情愿！”马思贞跟随其兄马思义，和愿意到边区的起义队伍一起毅然投奔陕甘宁边区，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 回民骑兵团里锻炼成长

马思义率领海固起义余部230多人，于1941年6月10日，来到陕甘宁边区环县庙儿掌，受到了边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不久，起义队伍移驻合水县柳沟。7月，马思义去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马思贞听到这一喜讯后，心中非常高兴和激动。不几天，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抗日回民骑兵团，任命马思义为团长，并派杨静仁为政治教员，马克为文化教员。1942年秋，回民骑兵团移驻延川县永坪镇，由于部队减员，该团只辖一个连。马思义被任命为该团团长，杨静仁为参谋长、马思贞为连长，马克为连指导员。这时，马思义赴延安中央民族学院后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连队工作主要由马思贞和马克负责。

同年10月，马思贞带领全连赴瓦窑堡剿匪，活捉了匪首，平息了匪患。

1943年春，马思贞带领部队响应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合水县东太白开荒种地2000亩。他抡起镢头，带头开荒，手上磨起了血泡，包上后，又坚持干。全连战士以连长为榜样，每人开荒近20亩，把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当年粮食、油料获得大丰收。1944年，马思贞又领导部队在固城开展生产，实现了粮、菜、肉与马草自给。

马思贞热情支持政治指导员马克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虚心向马克学习。在他们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生产、练兵，组织部队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部队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1945年10月，团长马思义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回团后，看到部队生产果实累累，训练成绩显著，面貌焕然一新，心里非常高兴。当他听了马思贞的汇报，看着站在面前的弟弟，简直判若两人，不禁感叹不已。

马思贞对部队既能大胆管理，严格要求，又能与战士打成一片，同甘共苦。他非常关心、爱护战士。当战士有病时，他总是亲自探望，进行安慰，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在一次行军途中，战士苏文卿患病，他发现后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食品送去，使苏文卿很受感动。马思贞执行纪律也很严格。有一次，战士马志武打人，违反了军纪，他在全连大会上，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散会后，马志武的抵触情绪很大，马思贞就找他个别谈话，讲明道理，耐心地说：“我们都是因为反对国民党才来到一起干革命的，我们十分痛恨国民党军队打人的恶习。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怎么能打人呢？这样不仅违犯了八路军的纪律，也会影响军队在群众中的威信。”经过批评教育后，马志武很快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表示坚决改掉这种不良习气。

## 陇东高原屡建战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当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于1947年3月又变换方略，进行所谓东、西两翼“重点进攻”。在陇东，国民党部队在占领华池县元城子后，得意忘形，企图越过子午岭，进犯陕北。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1947年5月，陇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国珍率领陇东十三团、十四团和回民骑兵团，在甘肃华池县红土崾岘伏击国民党军队。这时，回民骑兵团已扩编为两个连，马思贞任一连连长。5月18日，马思贞奉命带领一连阻击敌先头部队。敌方马继援八十二军骑二旅第四团约300人，由怀安城出发，来到红土崾岘西面王背梁。狡猾的敌人停止行进，派出40多个尖兵，下马搜索前进。进入我军伏击圈后，马思贞率领全连勇士纵身跃起，刀枪交加，杀声震天，敌人除一两个逃脱外，其余全部被俘，缴获步枪40余支、机枪1挺。整个战斗前后不到15分钟。

8月，回民骑兵团奉命在甜水堡沙坡追击敌环县自卫大队第二中队。临敌后，团长马思义拟命令部队冲锋。马思贞及时建议说：“团长，正面突击危险，如遇埋伏要遭受损失，应该迂回侧击。”团长采纳了他的建议，他立即率领一连策马迂回到敌后，使敌军背部受击，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次战斗歼灭敌人3人，俘获敌中队长及其部下20余人。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称赞马思贞：“是作战勇敢，有勇有谋的指挥员。”并说：“今天的胜利，要给连长记头功！”

## 英雄血染二轱辘塬

1948年5月1日，驻西峰镇之敌八十二军独立第五团千余人倾巢出动，向我陇东部队司令部驻地庆阳二轱辘塬猛扑，妄图逼我军离开，解除西线威胁。回民骑兵团和兄弟部队一起奋力将来犯之敌击退。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敌独立五团在大炮、重机枪掩护下，黑马队、红马队、白马队轮番冲锋。马思贞指挥全连坚守阵地，同兄弟部队密切配合，英勇阻击，全连三挺机枪直打得枪管发红。敌军被我部打死打伤百余人，当敌兵力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徐国珍命令部队后撤。马思义命令马思贞带领十余名战士担任掩护。

部队撤退后，马思贞继续指挥战斗。他派马智宽、周满福、杨生华、段敏政4人冲过敌人的火力封锁，占领对面山上的制高点。当马思贞站起身来用望远镜观察敌军阵地时，被敌人一梭子重机枪子弹将他的水连珠枪托打断，右腹部中弹，肠子当场露出体外，他满腔愤怒，忍着剧痛，用右手将肠子塞进腹腔，捂住伤口，左手按住后腰，用尽全力站起来说：“不要管我，继续阻击！”当时，几个战友连忙将他的衬衣扯开，裹住伤口，扶他后撤。但他坚定地说：“现在，只有我一个指挥员，我没有完成党和上级交给的任务，我不能撤，要继续战斗！”这时，他腹腔的鲜血顺着双腿流下来，淌进了鞋里，走起路来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但他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指挥战斗，还关心部下说：“周满福负伤了，去几个人抬回来。”

马荣怀、谢志敏和马希杰3人硬把马思贞拉进树林，背下后沟，送往柏树原的临时医院抢救。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子弹未能取出。生命垂危之际，马思贞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已经不行了，不能亲自参加解放全中国、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了，看不到家乡的解放了！你们要继续努力，为解放全中国、解放大西北而战，我们家乡的解放，已为期不远了！”由于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在转送后方医院的途中，马思贞溘然长逝，年仅31岁。

噩耗传来，整个军营沉浸在悲痛之中。回民骑兵团失去了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战士们失去了一位爱兵如子的好领导。马思贞的忠骨被掩埋在二轱辘塬，1954年移葬沙沟。1988年民政部追认马思贞为革命烈士。

马思贞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光辉形象将永留人间，宁夏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据《宁夏革命英烈》）

# 杨自福股匪被歼记

谢瑞祯

杨自福人称杨老二，本是河东一带的土匪头子。马仲英攻陷宁夏城后，他投奔了马仲英。

1929年冬，吉鸿昌部奉命南调。吉部调走后省防空虚，而驻灵武的刘志远旅长也只有一个手枪连，总共不到200人。这些情况被杨老二探知，遂于当年冬进攻灵武城。

灵武城有4个城门：西门住有4户人家。南门外俗称南关，住有10余户人家，经营饭馆和旅店。过护城河桥，在大路东西两边住有20余户人家，大部分为小商小贩。南关当时比较热闹，东门和北门的东南北三面距城300米处是西湖和秦渠，东西两边树木林立，渠道纵横，地形便于隐蔽，构成城西半部的天然屏障。据侦探报告，土匪杨老二率步、骑兵约四五百人，兵分两路，一路沿吴忠堡到灵武公路向县城逼近；另一路沿秦渠东西两岸直扑灵武。土匪人多枪多，而城内守军不足200人，民团10余人，警察也不过10余人。面对众匪，驻灵守军旅长刘志远、县长胡风阁、商会会长周老九、团总尹冀汤共议决定：军民联合守城。

当时，旅长全盘负责指挥防守城池。胡风阁协助刘志远督办守城事宜，维护社会治安。周老九负责供应守城官兵及团兵的食物。胡县长给磁窑堡第五民团团总刘天玉打电话，令他连夜带领人马支援灵武城。第五民团也不过10余人，但大部分民团兵是猎户出身，提枪射击，百发百中。这支兵力进城，加强了守城力量。

胡县长又规定：每户居民各出1人参加守城，由政府职员和警察按片区督促各户送人上城。当时，以城中心点新牌坊（现在广场西北角处）十字路口为界将城防分为四大片区，东北片区的人上东城墙，东南片区的人上南城墙，西南片区的人上西城墙，西北片区的人上北城墙。又在居民中抽出100名身强力壮者，每人发红缨枪一支，集中起来，白天由刘旅长派军官训练，夜晚分配守城。所有守城民兵皆由刘志远旅长统一调动。

根据地形，土匪可能从南边来，所以守城的重点放在了东门和南门。南城门以西，北城门以西和西城墙均为西湖所围绕。西门有一条土路，直通仁存和叶盛渡口。在原龙王庙（现安湖队所住地点）以东，土路两边大部被湖水淹没。当时要把西门外、南湖和北湖上的桥梁拆除，土匪就难以攻城。刘旅长把手枪连、红缨枪队、两个民团全部分布于南门以东，直至东北城角处，又组织4个巡查组不分昼夜巡查。

某日下午，土匪迂回到东南城门长带，凭借院墙、房屋等有利地形，集中兵力猛攻，未克。夜晚又连攻3次均未克。次日拂晓，土匪用搜到的梯子，捆成云梯，强抓百姓抬着云梯直扑城墙。土匪呐喊助威，枪声、叫声汇成一片，但后因土匪冲到了城墙根，而抬云梯的老乡却落在后面，匪兵被城上扔下的手榴弹炸得四散而逃。不多时，土匪又攻城，他们4个土匪、两个老乡为一组，每组抬一云梯，共5组，大批土匪跟在后面大叫大喊地向前推进。这时天渐渐放亮，城上守军又一顿枪弹，土匪攻城受阻。枪战持续一会儿，东方大亮，土匪全部暴露在东门外的开阔地带。他们死伤了10余人，两个抬云梯的老乡也被打死。土匪没有捞到便宜，便退隐房舍。

此时，南面的土匪攻入南关，占据民房，借有利地形向城墙上射击。刘志远旅长对周围的老乡说：“老乡们不要怕！土匪没有机关枪，没有炮，只凭少量的步枪，想攻下灵武城那是白日做梦！”第二天，土匪又在东南门一带拼命攻了两次，均被守军击退。只有进入南关的土匪时而向城墙上打冷枪。

东门一带的土匪进攻受挫后隐退院墙内再无动静。刘旅长判断：土匪将要撤退。于是，他派10余人手持煤油、棉花、麦柴等分组潜伏到南关民房后纵放大火。一会儿，南关一带便成火海。守军乘机大喊着冲呀！杀呀！吓得土匪慌乱地向南大路逃去。匪首骑马追上逃兵，重新组织匪兵反扑。

刘旅长在城头看到此种情况，命令打开城门，全部守军大举向南关一带反攻。匪兵不支，溃退至八蜡庙。匪兵凭借渠道、大路两边的沟壕等有利地形，慌忙布置兵力进行抵抗。追兵攻势猛烈，土匪压不住阵脚，又纷纷溃逃，守军穷追不舍。中午时分，匪军已跑了20多里路仍无法摆脱追兵，便溃退至连三寨一带奔入苏家寨，上寨墙布置防守。这时，匪军已被追兵层层包围。刘旅长派人喊话，迫使匪军从寨墙上扔下武器，打开寨门迎接官兵。徒手的匪军由一部分官兵看守，一部分官兵进寨内找了些绳子把120多名土匪捆了起来，押解回城，关在南城楼内，由手枪连派人看守。

回城后，120多名土匪全被处死。

（据《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

# 党史上的第一所行政学院

## 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

作为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所行政学院，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改革创新精神，为发展特色鲜明的现代高等教育作出有益的探索实践。

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建并管理的唯一高校。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创建于1940年7月1日，是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建，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兼任院长，目标是为边区政府培养政治坚定、廉洁奉公的新民主主义的行政干部。这是当时唯一一所由边区政府创建并具体管理的高等院校。其他高等干部院校均由党中央直接创建与管理。

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成立后，初设行政、财政经济、法律三系。另设普通科，学习期限为一年。1941年夏，学院设立法律本科班，同年秋，本科班并入延安大学法学院。1942年下半年，学院分设四系，即行政系、司法系、教育系和财经系。1944年4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会就改进边区教育作出决定：延安大学与行政学院合并，作为边区政府设立之大学，培养为边区服务的人才，仍命名为延安大学，学校设行政学院、鲁迅文艺学院、自然科学院和一个独立的医学系。行政学院设有行政、司法、财经、教育四系，行政学院院长由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专署行政专员强晓初调任，其教育、财经、行政、司法四个系的主任，分别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相关厅的厅长和法院院长兼任。1945年10月，中央决定：延安大学的自然科学院、鲁迅文艺学院、行政学院的大部分迁往东北继续办学，创建东北大学。至此，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在延安的办学历史结束。

联系实际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方针。行政学院与延安其他干部高等院校一样，坚持对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理想信念教育，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德育为先、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在课程开设方面体现“三为主”特色：即学习方式以组织学习、复习和讨论为主，开设课程以理论政策课、专业政策课、文化课等公共课程为主，各专业课程则以自主编写教材为主。1942年3月，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会确定了行政学院的办学方针。具体规定如下：一是学习科目要与政府工作沟通；二是学习科目要与现实沟通；三是学习程序由具体到理论。这次会议还根据以往教学经验与学校工作的实际情况，讨论了该院的办学方向，遵照“学的即用的”这一原则，强调在学习期间，应特别注意整理实际工作经验，毕业后，学校还应承担学生实际工作的顾问，教员也要参加县、区、乡的实际工作，搜集研究工作的实际材料，使行政学院成为边区行政工作的研究机关。课程设置既注意了各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又注意了陕甘宁边区的实际需要，目的就是培养“留得住、用得上、下得去”，适应边区各级政府需要的各类行政干部。

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办学的历史并不长，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的栋梁之材，也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学用一致。在课程设置与教学中，注意实际工作经验的整理和总结。师生通过参加边区县、区、乡政府有关的实际工作，搜集和积累实际材料，进行研究，编写有关财政金融、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规程、教材以及中小学课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司法、教育、行政等实践工作的总结和研究，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解决了边区实际问题，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多形式办学。行政学院创始于战争年代，特殊的环境决定了它不可能按部就班地单纯地以一种固定模式来办学。于是，行政学院开办了多种形式的培养模式，开设了培养边区县、区、乡级干部的具有相对固定期限的正规班，以培养财政、税务和教育干部为目标的专业训练班和以培养征粮人员为目标的临时班。正规班特别强调政治课、专业课。而对于专业训练班和临时训练班，则更多强调实际业务能力的培养，重视实际工作中经验的交流和总结，学习党的基本政策。

教学模式独特。行政学院的教学，以自学为主，讲授为辅，教师授课重在提出问题，学员参照教师提问的线索，广泛开展讨论和研究，包括做笔记、墙报、讨论会等。最后教师汇集讨论中的问题予以解答或对全课作系统总结。在教学中倡导民主与互助，学员对教师的授课内容可提出意见，教师组织学员互帮互学。特别强调教学实践，有关边区课程的实习多以参加延安南郊乡、新市乡和桥镇乡的实际工作为主，而专业课程的实习则多在边区政府各相关机构中展开，某些课程则直接以协助边区政府实际工作的方式进行。在课程的考核上，采用民主鉴定、个人总结和系班考查相结合，检查实际工作的成绩等方法，命题式考试较少采用。

行政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边区及相邻根据地的基层工作人员，同时也接收国统区与边区青年学生，从1940年7月正式开学起，共办了三期。第一期学员290人，第二期130人，第三期达到2000多人，但多数未毕业就合并入延安大学，学员基本熟悉地方现状，毕业后分配到实际工作部门去，所学与所用一致，毕业学员与学校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从行政学院走出去的学员，既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相关理论，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其中绝大多数成为地方上的行政领导，部分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家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学习时报》）